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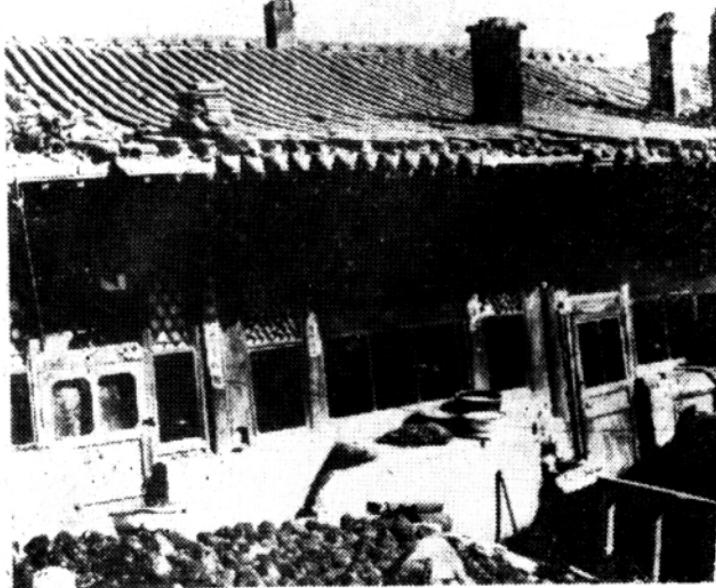
05105-

丰镇史料

第四辑

豐 鎮 县 志

丰镇县《丰镇县志》编纂委员会



李井泉同志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
在丰镇北洋堂居住原址



金 龙 大 王 庙

张宏光 摄

目 录

· 革 命 史 ·

悼胡一新同志.....	张文舟	忆述(1)
忆胡一新同志.....	秦力生	忆述(3)
和胡一新同志在一起.....	刘华香	忆述(5)
丰镇工作回忆.....	杨文江	忆述(6)
王进同志生平.....	段兴华	(56)
在丰镇工作二三事.....	降 贵	忆述(91)
丰镇县革命烈士英名录续编.....	田运兴	(171)
民兵英雄——陈佃林.....	周国栋	(129)
丰镇县人民政府组织机构沿革.....	丰镇县档案馆	(95)
丰镇县土地改革运动.....	米继文	(195)
丰镇县第二区十四泉村减租报告.....	党史办摘	(271)

· 志 乘 ·

丰镇县志·政治编.....	丁正贵	(15)
---------------	-----	------

- 丰镇县教育 丁德奎(58)
丰镇县解放前的商业 马步峰(105)
丰镇县气象事业的发展 米继文(231)
“小状元”起义 郝俊(185)
丰镇县社队工业纪略 丁正贵(178)
丰镇县国营工业企业简介 袁森(158)
丰镇县文化艺术概况 县志办(132)
丰镇天主教介绍 秦芳(226)
丰镇县农业机械事业的发展 马步峰(214)
丰镇县戒烟扫毒运动概况 邢吉和(255)
丰镇县民族资本工业 县志办(248)

• 资 料 •

- 丰镇寺庙介绍 连生慧(236)
大阳丰工委组织机构 党史办(280)
“薛刚山大曲” 县志办(264)
绥察行政公署布告 县志办摘(267)

丰镇寺庙平面图 杨名声 绘
李井泉同志居住旧址 (封二 照片) 党史办 供
金龙大王庙 (封三 照片) 张宏光 摄

悼 胡 一 新 同 志

张文青

从国际和平医院外科十四号，传出了沉痛的噩耗！胡一新同志因伤转剧，不幸牺牲了！残暴的日寇又夺去我们革命行列中一个忠诚、坚定而刻苦耐劳的英勇战友。

胡一新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们一二〇师雁北六支队的政治委员。现年三十岁，生于绥东丰镇县马岱镇一个贫苦的农家里。少年读书不久，就被屈于富家帮工，奴仆的生涯，饱尝尽人世欺凌压迫之苦；稍长，即逃外当兵，多年的兵士生活，又受到了皮鞭手板的冷酷待遇，愈加磨练了他的反抗与仇恨决心。一九三二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获得了光明斗争的途径。工作中党给予他的每个艰苦繁难任务，他无不乐于接受，坚决完成。一九三五年冬，他即参加抗日救国会，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努力。三六年，党派他赴绥东、雁北组织人民抗敌。三七年芦沟桥抗战军兴，他为着工作，往返平津，出生入死，数次脱险；九月返晋，随一二〇师北上工作，任晋绥边区宣传部长。三八年一月，调任雁北六支队政治委员，深入敌后，转战两年。当三九年秋，敌寇数路大举扫荡雁北根据地之后，胡同志于十月十六日率部二连，夜袭杀虎口，闯入敌宿营地后，亲率部一排，直捣敌巢，与敌在院子内搏斗，因而光荣负伤。

他的弹痕正中左腿膝部，骨头打碎了，在前方数次手术未

愈，于一九四〇年八月转来后方疗治，惟以体质亏损，抵抗力薄弱，当最末一次手术后，腹肠发炎，卒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十分在医院中牺牲了！

胡一新同志牺牲了，但他还永远留给我们的，是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与百折不挠的意志。例如一九三四年，他因寻找组织与工作，途经潼关，川资用尽，曾行乞数百里，始达西安。三五年为进边区工作（当时是苏区），曾三次被捉去当兵，又三次逃出；且抱病甚重，夜渡泾水，始脱捕縛。三六年派到雁北工作，因无社会职业，不能立足，曾到煤矿做工自谋生计，以掩护工作之进行。其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诚可为我们模范。

胡同志有着敦厚朴素的工作作风，他勇于求实，认真不苟，从来不计较个人的生活享受；他性情爽直，和善可亲，在雁北、绥东一带的群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胡同志且长于骑射，不管如何性烈的野马，即无鞍辔，他也可骑跑自如；长枪射击，一举不瞄，可击落天鹅。当此次负伤后，拂晓被战士背至山坡，尚伏草丛中打敌援兵，击毁敌汽车一辆，毙敌骑二十余人。

胡同志又是个虚心学习，肯求进步的模范，即在年余养伤期间，还看了很多书报。此次返延，每见同志，必告其伤痊后之学习计划，且殷殷询问延安各校学习课程，开下参考书单，憧憬着他出院后的学习生活，可是，何曾想到，他竟在不治之伤下与我们永诀呢？

胡同志死了，他为国家民族，流尽了最后的热血，他的光辉历史与革命精神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我们悲痛之余，誓以更大的努力，完成其未竟事业，来纪念胡一新同志！

（本文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上册第二期第94页。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作者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

忆胡一新同志

秦力生 忆述

一九三〇年九月，蒋阎冯大战以后，冯玉祥在山西汾阳一带办了个军官学校（有叫炮兵团的，有叫军官队的），那时胡一新同志（又叫胡一廷）就在那个学校学习。我也在那儿，但互不认识。

可能是一九三四年春天，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解散以后，胡一新同志就和一部分学员（大概有十几个）去了陕西，住了杨虎城将军的步兵训练班（也叫军官学校）。这个步兵训练班，开始叫入伍队，后来叫学生队。我是一九三四年九月（还是十月）去的西安，也住在这个学生队。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份，我和胡一新同志由西安市委介绍，离开学生队去了陕北苏区。当时准备去的人多，但由于条件差，困难大，实际走的人却少。和我们先后去的有张文舟（又名霍照汉，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李肩民（原云南省委书记）等同志。同年八、九月份，我和胡一新同志通过党组织的联系，和国民党东北军一起去了延安。

陇山战斗以后，我军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的一个师（正是我俩在的那个师），陕甘党组织就把我俩送到了瓦窑堡。这时，我

俩便去打听找李启民和张文舟二同志。谁知，当时正是根据地内部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袭击，形势极为危急的时候，他俩正和高岗、刘志丹等一起被扣（其实就是软禁），因我俩去打听，也被当成了怀疑对象，实际上也被软禁了起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红军上来了，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等“左”倾错误，我们才都被释放出来。组织上把我俩分配到“西北抗日救国会”工作，胡一新同志任救国会秘书，我被分配做宣传干事。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份，国民党八十二师袭击瓦窑堡，瓦窑堡失守，我们的那个机关便撤退到了吴起镇。这个时候，我在巡视团工作，胡一新同志仍在救国会工作。

同年九月还是十月份，中央派他去三边做了军运工作。（当时是邓颖超同志和我们谈的，我由于其他原因未去），从这以后，我俩便分手了。

胡一新同志受伤后，曾经住在延安和平医院，当时我是洛川特委书记，听到他回到延安治疗的消息，也曾去看望过他几次。那时他已经结婚。后来就牺牲了。

胡一新同志是老党员，具体在什么时间入党的，我记不清了。但我知道一九三四年春，他回西安后，学生队有个党组织，就是支部吧。支部经常和西安市委联系。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党员了。一九三六年四月，我俩到了延安，都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也是早先入党的）同年七月，我俩又一起重新入党，又是一起转正的。这个是肯定的。

对于胡一新同志的情况，还可以向张文舟、李启民二同志了解。这两个同志对胡一新比较清楚，你们再去访问访问他们吧。

和胡一新同志在一起

刘华香 忆述

胡一新同志是一九三八年杀虎口战斗中负的伤，伤很重，后来在延安治疗。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不多时便牺牲了。

胡一新同志大个子，很结实，长得也很魁梧。他三十多岁年纪，（比我大几岁）。他是个乐观人，会拉胡胡，爱唱歌，写的字也好，是个知识分子。

胡一新同志在一二〇师雁北六支队任政治委员，就是个半年多时间，（是组织上——牺盟会调去的）。因为当时主要是忙于打仗，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我也没来得及打问，这个可以向郑林、赵仲池、李登瀛他们了解。他们都是老同志，可能了解的多些。

总的说，胡一新同志在雁北六支队工作时间不长，有关他的一些经历什么的我都不大清楚，你们要向他们了解了解，往清楚搞搞。

党史办整理

丰 镇 工 作 回 忆

杨文江 忆述

一九四〇年春，绥南工委派我和曾泽西同志一起到丰东，协助罗重群等同志开展工作。曾泽西同志是一位老干部，曾在河北省搞地下工作。一九三九年，组织上调他来到了平绥铁路的马盖图、老羊圈沟一带工作。我带着绥南工委的介绍信，在马盖图找到了他，说明了组织的意图，简单地准备了一下，化装成卖杂货的货郎，每人挑了一个杂货担，由十八台车站上车直奔丰东。本来应徒步走，但由于我俩执行任务心切，都想尽快到达丰东，便征得地下党组织同意后改乘了火车。曾泽西年龄比我大，又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因此我虽然有点紧张，但看到老曾那副坦然自若的样子，我也就放心了。上车时，敌人检查很严，盘问我们上哪去，并用尺子量了我们的货担，由于我们装扮巧妙，敌人没发现什么，只好放行。我们在孤山车站下车时，又受到日本人的检查。我俩都穿着老百姓的棉腰子，平时出汗太多，散发着一股酸臭的汗腥味，再加上长久没洗脸，又黑又脏，检查我们的几个日本人都捂着鼻子，例行公事地检查一番，我们顺利地出了车站。

孤山下了车，又步行了几里，在黍地沟找到了罗重群同志。他当时是以动委会主任的身份在丰东公开活动。对于我俩的到来，同志们非常高兴，师学文、罗重群等同志给我们介绍了丰东的情况，希望我们尽快地熟悉环境，投入战斗。除了罗重群同志的身份公开以外，我们其他同志都进行秘密组织活动，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的工作。到五、六月份，我们的游击队已发展到五十多人，并成立了抗日地方政权机构——兴丰县委和兴丰县政府。师学文同志任县委书记，罗重群同志任县长，曾泽西同志为县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范德富、季文斗、李丰、杨俊英、宣成章等。区长是朱德美。不久，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五区区长。当时，我才十八岁，一点工作经验也没有，该怎么干，心里没点。师学文、罗重群等领导同志看出我的心思，主动找我谈话，并用他们自己的亲身体会启发、鼓励我。罗重群同志对我说：“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干部，都是在斗争中学习锻炼成长起来的，没经验不要怕，遇到问题多向组织上请示汇报，有困难多和同志们商量，多依靠群众一定会干好的。”其他同志也热情帮助我，为我出谋划策，我的思想顾虑随之消失，胆子也大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的活动范围也逐步地由官屯堡的獾子窝、十五坡、毛家营等地发展到常山天、大营子、红娘峪一带。有时还深入到黑土台滩等临近丰镇县城的地方。

丰东地区，敌人控制比较严。一些地势比较平坦的大村就都有敌人的据点，丰镇、阳高、大同城里的日伪军也常派特务、汉奸刺探情报，侦察我们的活动；同时，这里的土匪也很多，尤其是盘踞在盘羊山一带的大土匪徐喜，人比我们多，手下又都是一些惯匪亡命徒，他们暗中与日伪军勾结，欺压穷苦百姓，袭击我方工作人员，破坏抗日。我们的游击队，虽然也得到发展，但数量远不如徐喜，同时，我们的战士，又都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

军事素质较差，因而，我们暂时没有力量和他展开正面决战。当时，警备六团也常到我们这里活动，他们是大部队，活动范围大，土匪徐喜一见我大部队开来，马上隐蔽逃窜，大部队一撤，又返回老巢，同我们形成对峙局面。我们除了对付据点里的日伪军、特务和汉奸外，还得时刻警惕徐喜的袭击。我们的活动不得不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进行。有一次，我和通讯员刘维富两人化装成伪军骑马来到了黑土台滩的北吉沿村，这是黑土台滩中的一个较大的村庄，伪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据点，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正当我们召集群众宣传工作的时候，被据点内的一个伪军发现，他跟着我们，盘问我们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我们是县政府派来的。这一带是敌人控制的地区，一说县政府，就指国民党县政府。这家伙听说我是县政府派来的，再加上我口气很硬，真把他给唬住了。当我们出了村以后，敌人发现上当，据点内跑出二十多名骑兵追赶我们，一直追出黑土台滩。这一次，我们对敌人的情况掌握的不清，冒然闯了进去，实际上是一次冒险行动，不过，也锻炼了我们的胆略。还有一次，我们区小队几个人在北吉沿村活动，正碰上丰镇的敌人全面出动“清剿”抗日政府、抗日武装。敌人还未到北吉沿，附近村庄的老乡跑来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立即转移，摆脱了敌人的追剿。

我们在丰东地区的工作不断的发展，我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引起了丰镇、大同、阳高等城敌人的注意，敌人采取联合行动，一方面对镇川口和我们关系好的地方民团加以威胁，另一方面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向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进行合围清剿。面对严峻的形势，县委、县政府决定撤离丰东。一九四〇年秋天，兴丰县委、县政府全体同志和游击队全体战士离开丰东上了蛮汗山。当时已是深秋，天气很冷了，我们还都是单衣，有的连鞋也没有，环境十分恶劣，条件极其艰苦。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意志薄弱者、投机革命分子，开始动摇，以致发生了宣成章投敌叛变

的事件，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和严重的损失。宣成章是丰东常山夭乡大四号村人。其父是个“料面”（海洛英）贩，家庭很富足，他本人上过初中，在当时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县政府成立前就参加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曾利用他在当地熟人多，搞一些抗日宣传工作。县政府成立后，担任了科长。我们撤离丰东时，他要求留下来，我们上了蛮汗山以后，他又从丰东赶上了我们，在县大队当了文化教员。就在宣成章到后的不几天，工委决定由我负责带领县大队五十多人去丰镇三区财神岭一带开辟新区工作。在向财神岭进发的途中，在一个叫哥哥营（卓资山附近）村晚上休息时，宣成章假借外边有情况，把一部分队员拉了出去，投降了卓资山的日伪军，叛变了革命，当了特务。事后，调查清楚，在我们离开丰东后，宣成章就和他的老同学、卓资山伪军头目王风梧串通一气，作好了投敌叛变的准备。他上蛮汗山的真正目的，就是待机拉走队伍，投降敌人。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军解放了丰镇。当时我正在偏关休息。因为害眼病需要到张家口动手术，张家口也已解放。正巧，从绥远城里跑出来三十几个伪军军官被我们俘虏，要派人送到张家口去，组织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押送俘虏上张家口，路经丰东时碰上了李丰同志，他担任了丰东五区区长。李丰同志告诉我说，宣成章又混入革命队伍，分配到了黑土台工作。由于当时押送俘虏任务紧和眼病发作厉害，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宣成章的问题。在张家口住院期间，一连向丰镇党委、县政府写了三份材料，向组织上反映了宣成章叛变革命的问题。最后把这个叛徒逮捕归案。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我治好眼病返回丰镇，六月三十日，县政府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叛徒宣成章，除掉了革命队伍中这一隐患。

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秋天，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丰东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建立地

方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我党的声望和影响，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群众基础。但是由于丰东地区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我们工作中某些地方的失误，使我们没有能够坚持和巩固这块地方，最后被迫撤离。四十多年过去了，回顾这一段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客观条件上看：第一，丰东地区虽然地域宽阔，但是真正属于我们活动的地区只有南起长城，北至官屯堡滩，西起黍地沟，东至盘羊山麓这一段狭长地带，方圆也只有百十多里，尽管山多，沟多，便于活动，但毕竟迂回地方太小，从地域上限制了我们。第二，在我们活动区域周围，敌人都修筑据点，直接控制和监视我们。还有，我们活动的地区离大同、丰镇、阳高都很近，三个地方的敌人都可以一天往返，对我们直接造成威胁。第三，丰东地区土匪很多，除了徐喜外，较大的匪伙还有源浑天的杨永胜、杨二补来，小饮马沟的王小清等等，我们在对付日伪军的同时，还要抽出一定力量对付土匪。这样，给我们的工作从客观上又增加了复杂性和艰巨性。除此以外，从我们自己主观上看：第一，当时，从县长到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热情很高，积极性大，但对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不够，对党的方针、政策准确理解不够。比如在执行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团结了镇川口民团，使之成为我们落脚点和地下堡垒，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没有注意镇川口据点的伪军，没有认真细致地去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去团结他们。最后，他们向大同的日军告密，民团正、副团长被抓到大同活活打死，我们建立的地下堡垒也被破坏。丰东形势的突然变化，于这一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大同城里有一个青年学生组成的“聚义成”组织，很有爱国心，和我们关系也很好，应该主动去做他们的工作，把他们联合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增加和扩大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没有注意这一工作。第二，在发动群众工作中，我们只是通过

熟人、朋友、亲戚的关系联络、宣传、动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抓住有利时机，对丰东地区的广大群众进行普遍地深入细致的启发、教育、组织工作，使一些群众仍然对我们不太了解，尤其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在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没有能够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根。第三，丰东地区比较复杂。这里地域偏僻，在我们活动区域内人烟稀少，由于历史上遗留下的好勇善斗的传统风俗和宗族迷信的封建思想，这里的人当土匪、“赖小子”的多、加入封建迷信会道门的多。对于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因而对于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人审查不严，使的一些人形势好转跟我们走，一有变化就离开了我们，以至发生了宣成章叛变事件。第四，在工作中，我们和上级工委的联系和请示汇报不够，没有能够及时取得上级的指导。

以上这些方面，只是个人的一些粗浅想法，不一定正确，不过，至少这几方面的因素都是有的。好在大部分曾在丰东工作战斗过的同志们今天还健在，让我们共同来回顾我们的工作，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天的工作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集宁战役失利，我军实行战略转移。为了保存力量，上级决定丰镇县委、县政府全体干部撤出丰镇县，一部分调到平鲁参加学习，一部分上马头山继续坚持游击斗争。撤出丰镇后，组织上分配我和陈介平同志一组去平鲁参加学习。我找到丰镇县长阎景纯同志，他是留下来坚持马头山游击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向他表示了我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决心，阎景纯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把我分配到了马头山三区工作，林东同志担任区委书记，我任区长兼武工队长。李丰同志也留在了马头山，以搞贸易为掩护做群众工作。

我们撤出丰镇后，国民党的军队很快地占领了丰镇。并在丰镇、大同、左云等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十八、九个据点，企图围

控马头山区。马头山附近各村庄的地主、恶霸也依仗国民党的淫威组成还乡团，疯狂地向我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抓住我乡村干部和曾为我们办过事的群众不是用铁锹劈死，就是活活打死。手段极其残忍，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在马头山附近的一些村庄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头子，并四处张贴布告，震慑了敌人，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稳定了局势。

马头山区和丰东不同，这里是我们在抗战时期内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工作开展的也较顺利。很快地马头山周围的韭菜沟、獾子窝、十九沟、曹碾湾等地又成了我们活动的地区。在这些村子里，我们建立和恢复了地方政权，发展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到了我们周围。敌人轻易不敢出来活动。比如象獾子窝村据点里的敌人，我们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他们眼瞅着不敢乱动，同时，我们还和丰凉骑兵大队配合，他们前面打仗，我们紧跟着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情报网，发展两面派政权，使我们的活动范围由马头山周围逐步发展到离丰镇很近的马家库联、弥陀山、留云窑一带，有时还进丰镇县城活动。有一次，从晋西北后方送来一大包传单，我们派人进城，通过“内线”动员了一些进步群众，一夜时间把一包传单都发了出去，并在国民党政府的大门上贴了传单。伪县长魏纯美发现后非常吃惊，非常害怕，此后他每次出门身后又增添了一大帮卫兵。城内市民群众，看到了我们的传单，又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从而也增添了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信心。到一九四七年，丰镇铁路以西到马头山大部分地区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中，成为我们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组织上又调我到山西应县搞土改工作。苏谦益同志是土改工作队的总负责人。我和肖宁同志在一个组，组内还有李彬、王富贵、寇桃等同志。搞了三个月，到十二月份土